

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生态维度的继承与拓展

程丽琴^{1, 2}

(1.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2. 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蕴含着潜在的生态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劳动实践观、生态经济观和适度消费观等论述中。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激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其批判理论的理论原型,对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生态范式作出了重要推进与拓展。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同样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在自然异化解决路径上却有着本质区别,将二者的生态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从学理层面汲取有益的思想成果,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供镜鉴。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生态思想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12(2021)06-0090-07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之维

(一)劳动实践观。马克思强调实践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将自我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自然界,使自然环境从原本的自在自然不断人化。“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5}这里的实践概念被赋予了生产性的历史内涵,用以揭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劳动实践是人类实现目的的“对象化活动”和人与自然“物物变换”的自然循环过程的有机统一,生态劳动实践以“物质变换”的形式在自然生态环境中体现出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物质变换”概念来定义人类劳动,描述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依存的“对象性关系”,强调劳动不只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和桥梁,而且能够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物变换”,并使这一过程趋向合理化发展。首先,可以从主体与客体的角度来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过程。在劳动过程中,人在同外部自然界发生对象性关系的同时,也同自身自然发生对象性的关系,人要通过控制自身自然力来顺应自然、调控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从劳动实

收稿日期:2021-03-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的中国生态政治学逻辑建构研究”(16BKS062)

作者简介:程丽琴(1990—),女,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践的过程与结果来看,劳动可以使天然存在的自然物的使用价值向现实的使用价值转化,“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2]180},充当“物质变换”中介的就是人类劳动。并且,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仅包括自然物作为人创造的使用价值被人占有这一“由自然到人的过程”,同时包括了人把生产消费的“排泄物”再排放给自然这一“由人到自然的过程”,即人类的生产过程就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自然循环过程。

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恩格斯从物质代谢的角度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一定生产技术方式所支配的人类生活与生产行为不断渗透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与消费的复杂过程中,导致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人的活动的冲击;另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物,其自在发展又有着独立于人的活动而存在的客观规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的实践活动,因此,恩格斯指出人的活动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通过从物质代谢的角度分析“物质变换”的过程,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于生态环境的态度,即人的主体活动必须以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为前提。

(二)生态经济观。马克思生态经济观集中体现在他对自然生产力、自然资源的价值等方面论述中,通过考察自然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以及自然资源作为财富的生产源泉等问题,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

马克思认为,纯粹的自然力只具有自然属性,而由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劳动自然力则具有社会属性,并行使着社会职能,马克思称之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社会上的直接劳动者,主观上除了要有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客观上还需要具备生产的自然条件,而无论是劳动者还是生产资料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自然界,因此,无论是纯粹的自然力,还是人本身的自然力,抑或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都是生产力存在的自然基础。马克思以土地自然力为例,指出土地自然力是最原始的首要生产要素,提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土地递减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预见性地提出了生态补偿问题。他认为,资本所有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要掠夺性使用土地自然力,并由此引发生态危机。他将自然生产力视作社会生产力中的物质前提,要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维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即“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

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强调了自然物质的资源价值,并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角度分析了自然资源在财富创造过程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自然物质的效用指的是自然的使用价值,要使其具有商品价值,必须有抽象对象化活动,因此,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对象化的一般人类的劳动。商品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实现资本对超额利润的追求。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基于资本逻辑的利润动机,资本家们所关注的并非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3]195}换言之,在资本家眼中,自然界仅仅只是为满足自身利润需求的“有用物”,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性质。

(三)适度消费观。消费是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需求,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适度的消费能够丰富人的本质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却异化为了服务资本的一种手段,遮蔽了人们的真实需要,从而使人“片面化”。马克思关注到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通过对资本主义消费异化加剧生态问题的论述,提出了具有生态意蕴的适度消费观。

马克思从物的占有角度出发分析消费异化问题。对于消费的定义,一般是指人通过购买的

方式占有某物。而马克思认为,消费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占有,因为如果将消费仅仅理解为占有,那么人对精神产品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就会被物的占有的虚假需要所替代。人的本质是整体性的存在,对于物的占有应当有别于动物片面化占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商品刺激工人对物的需求,不断营造对商品的占有即幸福的假象。工人对商品的需要成为资本家不断获取商品利润的契机,加剧了资本的扩张,商品的使用价值被淡化,商业符号价值日益凸显,资本逻辑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起来。异化的消费助推过度生产,过度的生产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人与自然的矛盾由此加剧。

马克思从消费异化的根源上提出了适度消费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消费异化现象的根源,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自由竞争所造成的商品泛滥以及资本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都不能超过自然的承受力,要依靠节约劳动时间来发展经济,“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4]¹⁰⁷。恩格斯也从制度正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消费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而不是以人为制造需求来激发消费者的欲望,从而导致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颠倒。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生态维度的继承与拓展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从整个西方文明史出发,对20世纪西方工业文明展开了多维度的批判,指出启蒙由于其自身的矛盾,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他们围绕神话与启蒙的关系,通过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提出了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的生态思想。

(一) 劳动实践观之溯源: 启蒙理性的现实力量。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发端于启蒙并以启蒙为目标。那么,什么是启蒙?从词源学意义上考察,“启蒙”英文词源为“Enlightenment”,法语为“les Lumi è res”,均为光亮、照亮的意思。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给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下了一个很简洁但也很中肯的定义:“启蒙运动本质上是对有独立见解的知识活动的价值重估,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在以往一直黑暗的地方散布光明。”这一观点直指启蒙得以发生的核心要素,即“有独立见解的知识活动”。哲学家培根也指出,启蒙的目的是成为人们摆脱造物主奴役人们生活的力量,而知识就是这种强大的力量。在启蒙思想家看来,最初的知识源于自然。人们从自然中学到了如何利用自然,例如,指南针的发明让海船得以在迷雾中准确航行,无线电成为拉近遥远距离的桥梁。知识在现实实践中成为一种工具,知识对问题的每一次有效的解决,都更加确证了知识自身的力量。在康德那里,启蒙就是唤醒人类,人们通过独立地运用理性判断能力,摆脱不成熟和恐惧的状态。例如,常在西方文学和电影中出现的精灵与精神,事实上是人们畏惧自然的一种反映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精灵和精神被创造出来后,成了束缚人们生活的存在,而启蒙就是人们摆脱这种束缚的一种勇气和理智。在培根和康德的基础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进一步在《启蒙辩证法》中阐释了他们关于启蒙的理解。首先,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论断中指出,这样的知识与启蒙并不在于启蒙本身,而是将知识等同于权力。因为,在这里,知识的根本目的被理解为技术的完美运用,人们的目的不再是认识,而是希望能从认识自然中得到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方法。其次,不满足于康德关于启蒙的经典定义,从启蒙与神话的关系中,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启蒙的纲领就是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5]¹¹将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并用自身的生活而不是神话和权威来规定秩序。因而启蒙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将上帝的位置让给理性”。

显然，哲学家们对于人类理性之光的理解都离不开“自然”这一词。“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的物质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上帝在现实生活中的替代品。正如斯宾诺莎所说：“上帝即自然。”由此可见，至少在启蒙之初，“自然”的价值位阶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充当了某种人生向导的使命^[6]。

(二)生态经济观之归因：工具理性的转向。启蒙之初，人们热切呼唤着新的理性思维方式，也曾提出要向自然请教，但为何自然却一步步沦为了人类控制和征服的对象？回溯启蒙思想的发展历程，本是致力于摆脱宗教神学的理性，不断以人的主体性对抗自然的纯粹客体性，并试图通过科学技术建立一种对自然统治的全新形式。本应相互对立的启蒙与神话逐渐合二为一——启蒙变成了神话。

尽管神话与启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世界的方式，但两者的存在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神话的世界里，无论是人还是神都努力地在短暂的生命过程中掌握自身，而不是顺从命运。如同奥德修斯一样，他在航行和冒险的过程中，持久地等待和忍耐，放弃诱惑，选择不断的战斗，才最终赢得英雄的头衔。而奥德修斯之所以存活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在欺骗和失败之间选择了前者，即选择了理性。启蒙也是如此，人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常常遇到无法规避的矛盾，法律和规则便成了成熟的标志，成了类似于神话中的命运。神话的图腾经过改造又成了启蒙时代的词语和符号。例如，在古代中国，人们从对自然天象的畏知和对动物的崇拜中创造了象形文字，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自然的各种现象都被科学所证实，这些文字和文字所隐含的传统也逐渐消失了。在现代文明中出现的语词不像图腾那样直观，而语词所带来的抽象感和古时人们对自然的畏惧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换言之，以启蒙为目标的现代文明一方面使人们摆脱了神话的恐惧，让人们更加精准地认识了世界，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变成了使用现代文明的工具。正如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所指出的：“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5]34}

启蒙以科学和理性为标志，目的在于使人们从蒙昧的状态中解脱并进入光明和理智的世界。以科学、自由和民主为口号，人们建立了更加文明和自由的民主社会。人们通过理性获得了自信，以此指引社会实践活动，其在所从事的事业中获得成就之后，会更加坚定自身理性的正确性。中世纪的宗教所带来的“神圣瘟疫”^①被驱散后，理性和启蒙便成了时代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标志，启蒙被赋予了类似宗教的神圣“光环”。然而，“如同在神话中，奥德修斯将对物的独立性的改造这一任务交给奴隶一样，启蒙也以理性、知识和技术为手段重新分配任务。”^{[7]91}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以更加稳定的方式确认了自己的地位，人们更少甚至不再会去思考技术所带来的问题，“单向度”的逻辑使得启蒙带来了更多的现代性问题，人类变成了只为本能而生活，其他的变得不再那么清晰和重要。这样的情况，类似于一种“异化”，人的劳动和生活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从异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人对人的征服带来的种族危机与性别危机，最终揭示以理性为武器的启蒙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的愈加“空洞的恐怖”。资本主义与启蒙的合谋，让神话疑云之下的人们重又陷入了资本力量的操控之中，启蒙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新的“神话”。与宗教神话相比，资本主义时代的启蒙神话同样根深蒂固，并在“理性”旗帜之下获得了至高法则的地位。反对权威的理性主义启蒙，在经历了最初的叛逆与进步之后，最终形成了新的理性权威，阻碍了社会历史的进步。

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在启蒙的异化形式下出现了危机。在“神”成功地被启蒙“祛魅”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回归到了天然的状态。但这样天然的状态并不是本该有的和谐的状态，

随着人的权力的膨胀,人支配自然的力量日渐增长,就像最初人匍匐于神的脚下一样,自然成了人类权力的牺牲品。“尽管自我作为一种有机体,依旧被囚禁在自然条件中,但它却试图在反抗有机存在的过程中确证自身。”^{[5]44}过去,在神话盛行的时候,人的狂妄无畏被自然否定了,人们无法从自然的威慑下意识到自身的目的。随着启蒙萌芽和发展,看似自身目的的所有方面都显露出来,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得到了增强,人们转而可以支配自然甚至是其自身。但是,尝试摆脱自然束缚的过程,却又无意识地更深地陷入了自然的奴役之中。当启蒙和理性将这些目的都逐步实现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悄然发生。人对自然的支配,一方面是工业文明向前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对自然统治欲的膨胀。“现在的全球生态危机,是由于我们的贪婪、过度的利己主义以及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的盲目自满造成的。”^{[8]84}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现代性自然危机的出现,是人所拥有的权力关系导致的,启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运行,只要这一关系没有终止,危机就不会消失甚至会愈演愈烈。自然呼唤着自我,而这样的声音却因为人与其支配对象的异化关系而淹没。而这一现代性危机在启蒙的不断自我膨胀下,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的权力冲突。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反犹主义为例,揭示了种族危机的发生所包含的多重复杂因素。犹太人代表了与文明社会相对的原始的群族。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反犹主义,实际上是统治者对文明社会现有秩序破坏者的惩罚。就如同自然与工业文明的对立一样,原始的群族很容易就会被以极端的方式消除。当然反犹主义的发生,并不单纯只有政治因素,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自从犹太人将商品销往全世界,他们便成了资本家转嫁与劳动者矛盾的对象。也就是说,从表面来看,种族危机的发生是政治的因素,但其实仍然摆脱不了与经济因素的关系。启蒙带来的自然危机,体现为社会对抗自然的胜利,而反犹主义作为人性层面上对自然的消除,实际上就是启蒙逻辑在使社会同一上的运用。

(三) 适度消费观之拓展: 启蒙理性的扬弃。启蒙并不意味着无矛盾的同一,它所追求的使人摆脱无知愚昧的状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放弃自然的方面,只有重新去反思启蒙,才能进一步去思考启蒙自身所蕴含的同一的矛盾性,进而去理解如何解决启蒙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放弃以权力为中心的征服和牺牲。以奥德修斯为隐喻,在充满诱惑的冒险旅程中,他始终以对立的力量保持自身,为了回到故乡这一目标,所有多样性的诱惑便都被同一了。同样,人们在追求同一的现代文明和理性时,自然的多样性随着人类自身的目的变得模糊。不同的是,奥德修斯从不曾被赋予抵抗外来诱惑的力量,只是选择如何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规避诱惑,他选择在忍耐和放弃中实现自身的目的。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对立起来,在征服与被征服的状态中,那种和谐一致的原始愿望被忽视了。这不仅体现了启蒙进步性的衰退,也是文明衰退的根源。因而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指出,当自然本来与人能够和谐相处的面目被人们重新回忆起,对自然进行剥削和征服的欲望才会消退,对自然进行反抗的力量才不会与日俱增,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得到和解。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从根本上将人类社会理解为一个“大规模的团体”。启蒙从开始便以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为理想,但却在这个过程中又以征服为导向使人处于枷锁之中。特别是当启蒙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结合之后,便作为资产阶级摄取权力的工具,操控着带有控制色彩的系统。“一旦被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所驾驭,启蒙就会努力消除一切压制人民的秩序。”^{[5]81}当启蒙已经摧毁了自然和人身自由的自由世界时,启蒙需要做的便是重新找回失去的自身存在的意义。真正的自由并不是通过社会设定的理性的自由,也不是人们感性幻想出来的自由,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确实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仍然需要回归到自然,到自然中去寻找。正如人始终

无法摆脱自然,无法抛弃其他种族的同胞,更不可能保证女性永远温顺地生活在男性编织的诺言中。真正的自由,在这复杂的大规模团体中即使已经支离破碎,但仍旧不会缺少自然、种族和性别对自由的呼唤。在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看来,启蒙意味着一种进取和征服的意识。由于企图征服自然,让自然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而牺牲,人与自然的斗争便不断激烈,从开始时的地区、部分国家,演变为全球范围的危机。人从被神奴役的状态,翻身成为了绝对统治的地位,这毋庸置疑可以认为是启蒙伟大的成就。然而,外在的自然力被不断地合理化,这既克服了多样性的压力,也使得启蒙的精神被弱化了。

受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工具理性思想的启发,马尔库塞指出,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自然界已变成“商品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这样的自然不仅从生态和生存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空间,也阻碍着人从异化关系中觉醒。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消费异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同时也是生态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在传统理论中,消费仅仅只是一个经济范畴,是生产的一个环节。人们大多都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消费问题,而忽视了对消费异化现象的社会学、政治学研究,没有把消费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控制联系起来考察。在消费品充沛的社会中,对消费品的占有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社会共识,那就是:消费品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人们用不着为消费品“匮乏”而担忧。但是,人们在通过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同时,就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个社会仿佛有一种自杀倾向,人们在这场游戏中,以本能彻底毁灭全球”^{[9]9-11}。

三、理论评析

在对生态思想的理解上,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共通之处。一是他们都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问题。与那些过于关注主体需要而将理论抽象化的传统经济学家们不同,他们从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出发,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本性,更具有现实指向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毁灭性的破坏,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理性形而上学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人性的异化所带来的必然逻辑,期望自然自动实现生态恢复的愿望是必然要落空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逐利性吞噬自然资源,才能形成财富的不断积累。这一结论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遵循的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本质的重要论断。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克服自身弊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法兰克福学派将工具理性对自然的控制、对人的控制和社会冲突联结在一起,指出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的异化必然引起社会冲突,人最终将成为自己为控制自然而制造工具的奴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劳动生产领域的异化不仅继续延续,而且在新的领域产生了诸如消费异化、政治异化、社会关系异化等新的异化形式,要在这样一个不合理的、严重异化的社会中,依靠既有制度去解决矛盾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一结论与马克思所指出的仅仅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是无法克服其弊端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重要论断是相似的。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存在一些相同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还是差别。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差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主要运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逐利本性的揭示,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生态破坏的必然。正如恩格斯在批判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森林时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在“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中造成“无法弥补的裂缝”^{[10]919},带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滥用。法兰克

福学派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反人道主义,即一种人道主义的批判。人道主义强调人作为主体的作用,夸大了人的力量,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欲望不断膨胀,从而无情地压榨自然。法兰克福学派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正是始于对西方文明进程中危境深思的结果,他们通过揭露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欲奴役人的非人道的现象,指出是人道主义把人类推入了深渊之中。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坚定的、全面的,但囿于他们的这种批判只是站在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的一种对现实的声讨,缺乏科学的现实基础,因此在实质上仍然局限于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领域。二是批判目的的不同。阿道尔诺曾说:“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他所主张的是用非同一性代替同一性,用绝对否定代替辩证否定,其实质上是一种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马尔库塞也承认,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他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及由此孕育而生的生态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他们的理论陷入了悲观主义。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的并非为了批判本身,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1]⁴¹⁷。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的,哲学要发挥指导现实的作用,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态思想以及后来恩格斯所阐发的自然观的主要目的,都是在对客观世界的详尽而又客观的认识基础上,揭示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自然异化,进而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注 释:

- ① 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在其著作《神圣的瘟疫》中,将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宗教视作“神圣的瘟疫”,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的无知、对未知的恐惧以及神学家的欺骗。宗教迷信阴影下的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相结合,产生了“不容抗辩的文化霸权与政治霸权”,导致中世纪的人们长期处于一种浑噩无知的生存状态。(参见:北京大学哲学史教研室.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56、557.)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 [德]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 叶海涛,方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生态维度探究——以自然观念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17(12):39-44.
[7] 韩秋红,史巍,胡绪明.现代性的迷思与真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朱坦.环境伦理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9] [美]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刘志霞